【文化建设】

“公共文化”治理:出场逻辑与行动路向

曹爱军

【摘　　要】坚持文化秩序建构的社会主义方向,推进公共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公共文化是一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蕴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质,具有柔性治理功能的文化形态。“公共文化”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机制,它是在全球化时代与现代化进程相互叠加的时空场景下归位的。国家层面的文化竞争、社会层面的文化秩序、个体层面的文化权益,构成公共文化治理因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出场的现实逻辑。在国家治理语境下,还原并强化文化的功能、价值与意义,要求我们从文化自觉、文化生态、文化认同的视野审视公共文化,推动公共文化走向守卫国家文化安全、维护社会文化秩序、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轨道,最终达到促进国家文化认同和文化整合的深层目标。

【关 键 词】公共文化;文化治理;出场逻辑;战略面向

【作者简介】曹爱军,甘肃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甘肃省飞天学者(甘肃　兰州　730070)。

【原文出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昆明),2022.5.93~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各民族平等共享发展成果研究”(21BMZ048)、国家民委项目“新时代民族地区民生建设问题研究”(2020-GMB-014)、甘肃政法大学“国家治理协同研究科研创新团队”(甘法大科发[2022]10号)阶段成果。

文化是民族发展的精神血脉,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文化“是一个关于意义的结构”①,它为人的生活赋予价值意义和精神追求。在国家治理语境下,文化治理是一种柔性治理范式,展现的是人文精神在社会教化、文化传播、信仰塑造、认同强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公共文化是一种具有全民性、公益性和价值导向性特征的文化形态,对大众的文化意识、文化情感、文化行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公共文化治理作为当代中国的重大实践,有着深远的文化使命,那就是建设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民族文化精神结构和文化根性谱系,优化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转型社会,重建公共文化地带是文化治理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就是通过弘扬主旋律,倡导主导价值观,强调社会公平,注重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公益文化与商业文化良性互动,形成主流明确、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结构。公共文化治理是治理理念、治理实践与文化价值转换、文化体制改革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过程。公共文化要发挥“软治理”作用,必须立足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秉持系统观和生态观,实现对公共文化物质层、制度层、理念层及诸要素的系统集成,生成完整的公共文化治理体系。

一、作为治理方略的“公共文化”

(一)“公共文化”的概念释义

文化是人类精神的集体表达,在本质上具有“社会交往意义上的公共性”②。文化之所以具有社会交往意义上的公共性,是因为它是人在进化过程中创造的,脱离不了人的社会实践、相互依存和交往理性。在公共哲学意义上,公共性是质的相关性,被认为是“一种体现共同体生存价值的先验的普遍权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利”[③]。文化作为人们相互依存的社会活动产物，是经过后天习得的，在特定群体中具有共享性。文化的公共性“在社会性群体中突出体现为主体间核心价值的共识”[④]。有学者认为，文化创造从本质上说是人类对外部世界各种事物存在的一种价值思维肯定，这种肯定，既是价值的、功能的，又是形式、形态、法则、秩序的。[⑤]从本质上看，文化即是人们生活的样法，是由价值、规则和物态构成的整体。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应当着重于这样一个事实——文化附着于习得制度和支持这些制度的价值。

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形态，与公共领域不可分离。社会生活共同场域的生成与开放，以及民主化进程对人的文化权益的肯定，使得文化生活依托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剧院、俱乐部、文化空间，以及报刊、杂志、电视、网络得以开放和延展，产生了蕴涵“社会交往”“价值引导”意义的公共文化，[⑥]在凝结集体认同、培育公共精神、建构文化秩序等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⑦]我国“公共文化”话语的出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产物。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因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分野，导致了文化领域从“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繁荣文化事业与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文化建设的双重任务。[⑧]另一方面，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统揽一切”的文化发展模式在文化属性、类别区隔定位的驱动下，使文化产业回归市场、文化事业回归公益，它们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彼此依存，相互促进。

随着公共文化话语的形成，学术界对公共文化进行了阐释，多从公共物品属性及供给机制出发来定义公共文化，突出强调它具有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正效应性特征；关注的是公共文化的公益性事业特征，强调公共文化的社会效益以及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供给责任。[⑨]诸如此类的定义，揭示了公共文化的某些公共性特征，但多限于公共文化所依托之文化空间、文化场馆、文化设施及群众文化活动等显性的公共特征，对公共文化蕴涵的群体意识、公共观念、共享价值观等深层要素关注不足。事实上，公共文化以人们的精神旨趣和社会效益为目标，满足的是人们的娱乐、休闲、求知、审美、交际等精神需要。公共文化突出的是共有性而非私有性、共享性而非排他性、平等性而非差异性，是一种具有价值导向性和全民共享性特征的文化形态。

公共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它内在地依赖于规范化和理想化的交往结构，文化价值的共享性和文化功能的秩序性不容忽视。公共文化内涵着共识性的权利、利益、责任，基础性的规则、秩序、惯例，在公共空间建构、公共价值和伦理塑造中具有独特作用。公共文化既具有公共产品的一般特性所体现出的物质形态，也具有文化内核所蕴藏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诉求。界定公共文化的概念，应当注意到它有着丰富的内容结构，包括物质、制度和观念3个层面。物质层面是指公共文化的物化载体，如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事项、文化物品等；制度层面是指公共文化的制度体系，如国家文化体制、文化政策、文化机构等；观念层面是指公共文化意识形态和公共文化精神导向，包括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公共意志、公共精神等。

(二)“公共文化”的治理功能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文化涉及的是“审美艺术、道德规范、意义体系及教育科技”[⑩]。本尼特认为，价值观、审美、艺术等文化事态具有治理意义，它通过“审美与智性文化的社会形式、技术与规则”[⑪]来塑造人的意识、观念和行为。福柯认为，文化与权力是紧密相联的，文化以内化于心的方式发挥着权力的教化、规训作用。[⑫]公共文化是以满足人们求知、审美、娱乐、交往的精神需要为目标的，以文化传播、文化娱乐、文化教育、文化传承为内容，通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达到民族文化的代际传承和公共文化的全民共享。公共文化治理就是“透过文化和以文化为场域”[⑬]来发挥治理功能，达致“优化国家治理的精神结构和民族心理”[⑭]。

公共文化是由诸多文化义项集成的体系，要素多元，内容丰富。展开来说，文化法规与政策、管理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体制和创意创作、生产供给、传播交流机制等构成公共文化的制度平台；文化场馆、文化设施、文化资源等构成公共文化的物化载体；国家主导文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构成公共文化的内容样态。公共文化资源和设施的公益性和共享性，公共文化空间和场域的开放性和共建性，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性和共享性，公共文化价值的建构性和传播性，蕴藏着建构民众共享的观念结构和价值意义的潜能。[15]在公共文化的创作、生产和传播中，主体互动和集体行动会促进主流价值对日常生活的浸润，从而发挥软治理的政治社会功能。[16]

公共文化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诸多文化义项的集成和耦合，强化了其在文化涵化、文化整合、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功能，促进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培育、社会文化秩序建构和国民文化权益保障。新时代的公共文化治理，在安置诸如战略使命与发展路向、制度供给与机制创新、价值目标与功能配置等事项中，应密切关注与它们不可割裂的意义关联和价值关联，将健康文化价值观确立并涵化为国家信仰的价值标杆，[17]确保核心文化价值的坚守、公共文化生活的社会增量、民族文化维系的社会进化。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治理，必须以弘扬先进文化价值、保障公民文化权益、建设民族共同文化家园为须臾不可偏离的目标，实现公共文化建设多重功能的存在性均衡和整体性协调。

费孝通指出："社会问题起源于文化失调。"[18]我国公共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引发公共文化地带的式微，带来大众生活的自利化和疏离化，社会公共意识、公共舆论、公共道德、主导价值显现出弱化趋向。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转型社会，公共文化治理在社会公共价值与公共利益的层面具有深远的使命，那就是建设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民族文化精神结构和文化根性谱系，重建大众的精神世界和栖居方式。公共文化治理关乎国民文化享受和文化认同增进、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生态维护，必须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正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竞争性共存，关注它们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动态平衡，以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发挥公共文化在先进文化传播、文化权益保障、文化秩序建构中的作用。

二、"公共文化"治理出场的现实场域

(一)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竞争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单纯的硬实力较量，而越来越明显地整合了软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的较量。在国家软实力构成中，文化乃是核心和深层的要素。[19]捍卫文化主权事关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国家主权的完整性。[20]在权力角逐和利益博弈的国际竞争中，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乃是国家安全的深层次内容，构成国家安全维护和社会制度竞争的重要基础。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中，"最终的决定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精神的较量。"[21]毛泽东说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较量，很大程度上是各自信仰的世界观的交锋，他们都想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不论是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乃至"阿拉伯之春"，无不深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颜色革命"显示出文化和价值观的极端重要性，守卫精神领土，捍卫文化主权，应当引起民族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国际体系中，资本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形成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排他。西方国家试图借助其主导的国际话语矮化中国，试图通过"文化入侵"扰乱中国民众的价值信仰，蓄意抛出"中国威胁论"，试图遏制中国和平崛起。在国际交往中，它们常以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划界，大搞"价值观外交"，试图在国际上分化、孤立中国。近年来，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崛起，以"共同价值观"的名义到处纵横捭阖，鼓吹美、日、澳、印四国联手主导亚洲事务，试图抑制中国在亚太事务上的话语权。面对西方世界的文化渗透和战略遏制，中国需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不断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增强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文化吸引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等软实力。毫无疑问，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得到极大提升；但长期以来的非均衡战略和经济优先发展，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国家文化软实力培育任重道远。必须重视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精神支柱坍塌、文化阵地丧失、意识形态失控，社会成员的价值规范就会陷入混乱，国家安全就无法保障。”[22]

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上深刻阐释中华文化蕴涵的“和合”“互惠”“推己及人”的和平文化观，宣扬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且要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日用生活和交流互动上“镌刻”中华文化元素和精神气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增强文化生产力、文化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反观现实，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文化创造和输出并不乐观。在全球文化市场中，中国长期处于国际文化贸易逆差的地位，文化产品进出口结构失衡。在中国文化产品有限的海外市场中，文化出口产品中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等硬件设施所占份额较大，创意性、理念性、价值性的文化出口相当有限，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照。相比之下，美国的好莱坞电影、英国的科幻影片、日本的动漫业、韩国的家庭伦理剧，在国际市场都有不菲表现，成为国家文化形象展示的窗口。积极应对全球文化竞争，需要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审视文化发展，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竞争，有效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与文化身份，防范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

(二)竞争共生中的社会文化生态与文化秩序

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在的基本样态。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在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各民族文化相互竞争、碰撞、交流、融合，汇聚形成了中华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辩证发展过程中，诸多民族和地域文化上的竞争、交流和融合，使中华文化日渐丰富和包容，形成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传统，结成了“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在文化赓续与发展的传承意义上，任何文化都不能割裂与历史联系的“脐带”，文化变迁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承继中的创新性共存；在文化生存与互动的生态意义上，任何文化形式都不能孤立存在，文化系统是多样化的文化形式的集合体，它们在竞争性共存中维系着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平衡。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是在政治维度“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多重变奏，经济维度“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交相辉映中向前发展的。这种文化发展路径，造成了多样文化形态并存的生态格局。从文化形态折射的价值取向来看，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使社会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大政方针的根本性调整，犁松了政治意识主导一切造成的已板结碱化的文化土壤，大众文化的稚芽开始萌动、生长，并进而形成今天的繁荣景象”。[23]大众文化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文化形式，在满足大众多样化文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大众文化主要是围绕消费展开的，更多地与休闲娱乐和个人意志的张扬相关联，具有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娱乐化的精神实质、通俗化的表现形式。大众文化发展一旦失去自我约束和必要制约，很容易坠入“怎么都行”“跟着感觉走”的境地，诱发社会生活文化价值的失范，并对主导文化、精英文化等文化形式带来一定的挤压和威胁。与此同时，公共文化地带的式微，人们对“私域世界”的追求、对娱乐功能的迷恋成为常态，一些地方文化建设甚至出现“逆流”，以“三俗”为表征的文化形式裹挟而来，造成对健康文化价值的冲击，危及基层社会的文化秩序和价值认同，以及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文化整合。公共文化地带的式微引发基层社会公共意识、公共舆论、公共道德的弱化甚至异化，民众生活日渐世俗化、自利化、疏离化，基层社会的“公共性”正在消解。

文化的多样性必然带来不同文化形式之间的竞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争，而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会使某些文化形式强势成长为“脱缰的野马”，极易使其携带的极端化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样式扩散为全社会竞相追逐的对象，使人的文化生活陷入肤浅、单调、庸俗。文化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价值影响力，文化发展如无秩序规约，就会造成文化的消费主义化，商业文化、快餐文化大行其道，人们就会热衷于日常娱乐和感官刺激，造成人类情感的技术化和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泛滥，侵蚀人之为人的品性和特质，以及人的反思精神、批判意识和鉴别能力。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文化系统生发出应有的秩序，使各种文化形态都能存在下去并相互制约，避免对彼此的生存空间和功能边界形成“僭越”。文化系统内的诸多文化形态必须保持自律和克制，必须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达成动态均衡，从而使文化系统处于协调性、确定性和连续性的状态，形成一套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规范体系，建构起一种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的文化秩序。重建一种把握文化发展规律的秩序何以可能？这需要我们明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理性认识各种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将文化系统的诸多文化变成相互有意义的整体性关系，使各种文化形态各在其位、相互促进、有序发展，共同服膺于国民生活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寄托。

(三)权益保障下的公民文化权利与文化需要

当今社会，权利已发展成为思考、评价一切社会问题的重要标尺。全球范围内人权运动的深化，使人权观念得以拓展和深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进入人权的结构，成为与“自然权利”并存的“社会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是一种积极权利，[24]国家应积极作为。在权利意识上，文化权利的觉醒相对较晚。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政策大会”召开，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把广义的文化问题纳入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战略。“在某种意义上，一项权利的存在，意味着一种观念和制度的存在，意味着一种文明秩序的存在”。[25]全球范围文化权利的勃兴，使保障文化权利、文化利益成为国家的一种道德义务，成为正义的国家行为的重要标志。我国宪法明确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宪法除了对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政治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外，也对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做出了明确规定。现代社会，公民权利与国家义务是相伴随而存在的。在一定意义上，公民的权利构成国家的义务。宪法对公民社会权利的确认，表明国家允诺对其实现承担保障义务。

权利在深层意义上，是一种基于人性关怀的信仰，是对生存的一种理想、一种盼望，包含着“人应该是什么”的思考。[26]人类尽管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样式，但是，文化多样性并不排斥文化权利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体现在：一是文化权利价值的普遍性。任何国家对文化权利的尊重都应当与“普遍的善”(诸如德性、幸福与正义)相联系；二是文化权利主体的普遍性。任何人都不应当被任意排除在权利享有的范围之外，除非他自愿放弃对权利的主张；三是文化权利内容的广泛性。文化权利不是单项权利，而是逻辑自洽的一组“权利束”，包括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以及对个人进行文化艺术创造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的保护权。文化权利作为一项社会福利权利，涉及公民文化生活上的底线公平，要求政府予以积极保障，自觉承担“最终给付担保责任”。确认政府对公民文化权利保障，不仅是公民权利理论逻辑的应然表达，而且是政府担负“生存照顾之责任”的必然选择。

文化权利的勃兴，是与社会文化需要紧密相联的。文化生活是人的一种内在的普遍需要，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着文明的演进，文化需要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内容和形式。需要层次论揭示了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发展性，指出人的需要总体上遵循“剥夺-主宰”和“满足-激活”的规律。当人的基本生活得到满足后，精神文化需要就成为主导性的需要。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国民的消费结构会从物质消费偏重逐渐转向物质与精神消费并重。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40多年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的经济超高速发展，使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7.7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国民消费结构发生重大转变，文化需求得到快速释放，文化消费呈现出内容丰富化、形式多样化的态势。大众已经不满足于听广播、看电视、读书看报等文化形式，文化娱乐、教育、体育健身、文化创意、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成为文化生活的热点。随着大众文化意识的增强，内容创造、科技赋能、业态融合、模式创新成为驱动文化发展的新支点，文化需求和消费持续升级，以追求参与、互动、体验、共享为特征的精神文化方式成为新的期待。面对社会发展蕴含的文化期许，文化系统应予以积极回应。

三、“公共文化”治理面向的行动逻辑

(一)文化自觉的战略意识

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文化发展必然与历史进程中的特定阶段相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我国确立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战略，社会文化生活围绕着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政治信仰展开，社会文化生活呈现出单一性和同质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思维，文化政策逐渐转向对文化事业发展的规范调控、对大众日常文化生活的价值引导。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较以往任何时期更加重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党和政府以更加高远、宽广的视野审视文化发展问题，除了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主权拱卫外，文化需求、文化权益、文化生产力成为文化战略的重要关切。

文化自觉反映的是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高度重视和科学认知。文化自觉，是相对于文化自发而言的，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27]。文化自觉既是一种文化意识，又是一种文化价值观，也是一种文化实践论。在认识论上，文化自觉是人作为认识主体借助于一定的思维和方法而达到对文化(认识客体)的一种认知性把握；在价值论上，文化自觉是人的一种价值建构和价值追求；在本体论上，文化自觉通常是对人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自觉。讨论文化自觉，不能脱离国家战略方位和文化发展方向。新时代的文化自觉，要求全社会——特别是党和政府，要对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建设方向有清晰的把握，确立自立、自省、自强的文化发展观念，担负起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文化强国的时代使命。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指出，“如果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则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28]。文化是在长期的延绵不断的建设中发展和进步的。人民是文化发展的建设者、创造者和传承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人民大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唤醒人民的自觉意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向……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29]，承认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目标主体、创造主体、享有主体地位。坚持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要始终恪守任何高品位的文化艺术作品其实都源自于人民群众鲜活的现实生活中的信念，保持积极开放、虚心融合的文化吸收心态，实现在文化表现上的主体性、开放性、兼容性和批判性的统一。

承认人民群众文化主体地位，文化建设既要突出文化的人民性，也需要坚守文化的先进性。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文化活动进行“目标引领”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制定和坚持的“双百”“二为”“三贴近”的方针政策，对巩固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预防人民群众文化劳动的异化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30]尊重人民群众文化主体地位，需要文化精英深入民间创作文艺精品，确保先进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引领和“反哺”。文化战线上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艺术家深入并根植于人民群众文化创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造生活之中，真心实意地对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动给予悉心指导和诚挚关怀，保证了文化生活的精神内涵和水准。

一个健康的文化主体必然能自知其所创造文化的基本走向和价值所在，从而目标明确、思路清晰、自觉自为地开展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公共文化建设，不能割裂历史传统，不能脱离时代主题。公共文化既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更需要当代主流文化的引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性表述，滋养着公共文化的精神根脉和人文价值；当代主流文化的生活化和通俗化，引领着公共文化的正确方向和历史任务。公共文化治理，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注重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公共文化治理追求文化主体的普遍性和参与性，追求文化生活的导向性和丰富性。随着文化主体的自觉参与和自主创造，公共文化空间和公共场域得以形成和扩展，大众的公共意识、公共精神、公共责任在文明健康的文化生活中会塑造起来，崇德向善、明礼知耻的伦理新秩序得以构建。

(二)文化生态的战略面向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生态，也离不开文化生态。良好的自然生态为人的发展提供着可持续利用的资源，维系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良好的文化生态则包涵着丰富的、多样化的文化形式，为人的发展提供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对于人性的塑造、人格的形成、素养的提升，以及民族精神与国民性格的形成，都具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可以说，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破坏自身的文化生态，割断与历史文化的联系，淡漠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弘扬，破坏文化形式的多样性，则注定自身将逐渐走向衰落，将失去在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应有的位置。

这里的文化生态，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概念，它指称的不是“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31]。它是对自然生态概念中生态学方法的借用，是对现实社会中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学考察，用以表示文化系统中多样文化形式之间的关联结构。文化生态是关于文化性质、存在状态的一个概念，意指文化系统中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之间的结构形态与交互作用。[32]文化生态是一个多维、动态的概念。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是历时性的生态关联，体现的是文化生态意义上的遗传性变迁；而同一时期不同文化形式——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是共时性的生态关联，体现的是文化生态意义上的竞争性共存。

社会文化系统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形成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并存格局。主导文化是建立在国家权威之上的，是具有正统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形式，它旨在促进政治合法性和国家文化认同。主导文化因其具有凝聚、评价、选择、导向、延续等功能而决定着文化生态的发展方向。精英文化是知识精英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精英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神水准，其内涵的价值观对于社会具有长久的影响力，具有主体创造、规范引导、社会教化、批判现实等功能，发挥着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关联的纽带作用。大众文化是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注重人们感性娱乐的文化。大众文化是随着工业经济快速崛起的，成为普通百姓最重要的精神生活需求，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和渗透性。虽然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有各自不同的基调，但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需要不同文化间的良性互动。

强调“文化生态”的平衡，就是要正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竞争性共存，在“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提倡多样化”。在推动文化发展中，应注意它们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动态平衡，既要注重发挥先进文化引领文化方向、建构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以主导文化引领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为大众提供精神食粮；又要以精英文化的思想指导、学术修养来提升大众文化，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也要以大众文化扎根民间、贴近生活、易于传播的特征，满足大众日常文化生活，并为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提供素材、养料和动力。在文化发展“二水分流”格局下，文化建设既要实现公益性文化事业均衡发展，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又要引导经营性文化产业合理布局，培育文化市场和文化业态，使二者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形成互促共赢的发展格局。

公共文化是面向大众的，承担着文化价值引领与文化需求满足的功能。公共文化治理必须对现实的社会文化生态做出回应，重新发掘公共文化对深层意义的检讨和公共价值的建构，明确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和价值诉求，避免使文化建设蜕变为日益感性化、娱乐化和平面化的文化形式。公共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核心价值引领、公共需求导向的诉求，使其通过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传播先进文化，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展开来说，“核心价值引领”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文化建设；“公共需求导向”体现为公共文化服务以保障文化民生、促进文化公平为宗旨，致力于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可以说，公共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公共性，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交流互动的纽带和桥梁，发挥着传播先进文化、保障文化权益、建构文化秩序的作用。

(三)文化认同的战略使命

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交往、交流全方位、深层次地展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在促进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同时，也对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带来威胁。在世界范围的文化较量中，中国要居安思危，警惕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入侵。就此而言，建设民族文化精神结构和文化根性谱系，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和文化栖居方式，是国家治理不可易移的目标。公共文化作为全社会共建共享、具有价值导向性的文化形态，促进国家文化整合和文化认同建构是其深层的治理任务。要努力凝聚全社会对民族复兴和文化强国的理想信念，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根脉，建构并传播中华文化价值观，深刻认识和把握文化治理的底层逻辑和战略使命。

认同回答的是“我们是谁”的问题，本质上是意义的建构过程。[33]在心理学上，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34]，表达的是人的心理过程的一种结果。哈贝马斯认为，认同是产生于主体间的相互依存和交往理性，是彼此之间的接受和认可。[35]亨廷顿认为，不同的人群“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36]，用于区分“自我”与“他者”。在政治国家层面，凝结认同是至关重要的，它“关乎思想观念、价值认知、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判断和选择”[37]，因而关系到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伴随着文化的习得、传承和创造。文化“作为一套行为系统，其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38]。作为文化的主体，人只有认同他所归属的共同体文化，认同共同体奉行的价值观，才能融入共同体并获得成员身份。

现代民族国家无不致力于认同建构，包括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在诸多的认同形式中，文化认同是最原初亦是最深层的认同，它是人们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霍布斯鲍姆说：“基于文化认同而形成的国家认同是国家开展行动的价值基础”。[39]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根基。[40]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的文明冲突、文化竞争和意识形态博弈此起彼伏，欧美国家借助强势的文化行销模式和商业化机制，蓄意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影视作品和生活模式，试图解构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带来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兴盛，积极的、消极的，健康的、腐朽的，高雅的、庸俗的，进取的、颓废的……各种文化伴随市场化裹挟而来，对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系统带来冲击。如果不能赓续中华文化的根性，守卫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就会陷入文化认同的危机。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意识、信仰、情感和生活方式之上的，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价值层面的肯定性体认和归属性凝聚，[91]以此展现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和根性。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国历史和文明的进程中，各自的文化要素相互借鉴、彼此交融，熔铸成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华文化，形成对各民族文化的统摄和引领。在国家治理的意义上，文化认同是国家意志的精神指引和国家建设的价值向导，凝结着社会的价值体系，塑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焕发着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在全球文化较量的语境下，文化认同关乎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守卫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是消解西方腐朽文化侵蚀，应对文化霸权主义挤压的凭借。

公共文化是具有价值导向性和全民共享性的文化形态。公共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先进文化、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不可或缺，它们构成公共文化创作、生产、供给、传播、享受的原料和动力。正是这样，公共文化以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态，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大众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性等方面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通过公共文化建设，发掘并创造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并且民众乐于接受的文化事项，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和栖居方式，是公共文化治理的应然功能。这一实践取向，将强化民众对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秩序的关切和体认，加深对民族文化谱系和精神内涵的体验和情感，使大众不至于在日用文化、商业文化提供的感官享受中蜕变成“单向度的人”，从而产生更高层面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内在地绵延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注释：

①汪倩倩：《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理论范式、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载《江海学刊》2020年第5期。

②李景源，陈威：《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③[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39页。

④任珺：《文化的公共性与新兴城市文化治理机制探讨》，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⑤司马云杰，陆学艺：《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1页。

⑥傅才武，何璇：《论近代公共文化领域在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

⑦王智洋：《中国语境下乡村公共文化领域的变迁与重构》，载《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2期。

⑧许明，等：《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⑨陈鸣：《西方文化管理概论》，太原：书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⑩张良：《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文化治理》，载《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⑪ Tong Bennett. 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 L. Grossberg, Nelson and P. Treichler(eds).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⑫[法]米歇尔·福柯：《福柯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

⑬吴理财：《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⑭胡惠林：《文化治理中国：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空间》，载《上海文化》2015年第2期。

⑮颜玉凡，叶南客：《践行文化自信的公共文化治理：价值内涵、实践场域和行动取向》，载《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⑯任贵州，曹海林：《乡村文化治理：能动空间与实践路向》，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⑰徐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视域》，载《文化艺术研究》2014第3期。

⑱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⑲[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⑳吴满意，孙程芳，谢海蓉：《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选择》，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

㉑王文理，屈全绳，刘红松：《和平演变战略及其对策》，北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京: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㉒郭建宁:《中国文化强国战略》,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㉓许明,等:《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

㉔俞可平:《人权与马克思主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0年专辑。

㉕夏勇:《中国民权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65页。

㉖麻宝斌:《十大基本政治观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㉗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载《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㉘[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6页。

㉙《"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国网,2021年6月9日,http://news.china.com.cn/2021-06/09/content_77556916.htm.

㉚徐国亮:《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载《红旗文稿》2021年第24期。

㉛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发表了《文化变迁的理论》,侧重探讨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由此创立了文化生态学。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研究文化,重点在于探讨自然生态环境与特定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解释不同文化模式赖以产生的自然生态根源。就此而言,文化生态学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分支,用以对特定文化模式的产生与演变提供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

㉜李毅,荆林波:《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功能目标及其实践路向》,载《甘肃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㉝[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㉞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

㉟[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㊱[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㊲程同顺,邢西敬:《合法性、认同和权力强制:制度权威建构的逻辑》,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㊳[美]R.鲍柯克,K.汤普森:《宗教与意识形态》,龚方震,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

㊴[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5页。

㊵王洪兵,张松梅:《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耕耤制度与十八世纪清王朝国家治理的文化策略》,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㊶郑晓云:《文化认同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7页。

Governance of "Public Culture": The Logic of Emergence and the Path of Action

Cao Aijun

Abstract: To uphold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order, it is indispensabl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e. Public culture is a cultural form that conforms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contai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nd has the function of flexible governance. As a mechanism of state governance, "public culture" returns to its place in the temporal-spatial context of the superposi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ompetition at the state level, cultural order at the social leve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constitute the realistic logic of public-culture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state governance, restor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function,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requires us to examine public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ec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 promote public culture by following the track of safeguard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maintaining the socio-cultural order and safeguarding the citizens´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final goal of promot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public culture; cultural governance; logic of emergence; strategic orient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